

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结构特点 及变动趋势分析

——以北京为例

高 颖,张秀兰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宏观人口统计数据 and 2004~2013年的婚姻登记业务数据,以北京为例,对比分析了本地人口、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结构特点和发展变化趋势。相对于本地人口,迁移人口普遍具有中心城区户籍以及较高的教育文化程度和职业序列层级,流动人口的结构相对复杂,但在婚配过程中出现明显分化。“两地婚姻”在形成稳定的北京新移民群体的同时,也蕴含着规模可观的潜在随迁人口,这对总体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并可能产生若干问题和矛盾,相关部门应做好政策应对,促进大城市人口多元化进程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特大城市;人口结构;人口迁移;人口流动;北京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05/j.cnki.1004-129X.2016.02.002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6)02-0018-11

【收稿日期】 2015-1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口流动背景下大城市的婚配特点及其影响研究(14BRK029);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近年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13SHB012)

【作者简介】 高 颖(1977-),女,天津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张秀兰(1963-),女,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一、引言

改革开放和城市化拉开了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序幕,催生了一批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2014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进行划分,其中“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 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 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1]依照此新标准,我国将有10个左右的特大城市,其中北京和上海为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成果的一种体现,然而人口的过度聚集和膨胀也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交通、能源、住房、就业、公共安全等,“严控人口规模”由此成为近年来特大城市建设规划中的首要任务。事实上,城市人口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结构也随时代变迁而发生显著变化。城市人口的多元化与人口流迁相伴而生,外来人口作为大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口



结构的改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大城市的外来人口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主,进入新世纪之后,“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长起来并加入流动大军,与此同时,非农流动人口的比例明显上升,城市间的移民数量亦快速增加。这些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属性的外来人口的加入使得大城市的人口构成更加复杂和多元。

目前关于我国特大城市人口问题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数量和规模层面,力图找到有效的人口调控策略;或者就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比如针对年龄结构探讨人口红利问题,针对居住结构探讨人口的空间分布问题,针对就业结构探讨人口与产业布局问题等。这些研究普遍意识到外来人口对于特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但对于外来人口的定义比较笼统,对人口构成的多样性及其特点关注不足,缺乏基于翔实统计数据的细化比较和分析。

外来常住人口成为总人口的重要部分、城市人口日益多元化已成为特大城市人口发展的常态;相对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上的特点更值得我们关注。外来人口在年龄、教育文化水平、户籍身份、职业类别、婚姻状态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其发展潜力、居留意愿和可能性自然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从宏观的角度讲,不同的外来人口结构特点和变动趋势对于城市未来发展的影响深度和力度必然会有所不同。

本文基于人口统计大数据,以北京为例对特大城市的人口结构特点、趋势及可能影响展开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的人口形势有一个更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同时发掘人口调控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和困境,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照和政策预警。

二、人口流迁与人口增长情况概述

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涌入是特大城市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北京市逐步形成了“低自然增长、高机械增长”的人口发展格局,常住人口规模屡创新高。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2014 年末北京全市的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2 151.6 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比 38.1%。^[2]图 1 显示了 2000~2014 年的北京市人口变动情况,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市户籍人口的数量相对稳定,而常住外来人口数量的变动趋势与常住人口高度一致,可见外来人口的机械增长已成为决定北京人口总规模的关键因素。



图 1 2000-2014 年北京市人口构成及变动情况 (万人)

资料来源:2000~2013 年数据来自《2014 北京统计年鉴》,2014 年数据来自《北京市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北京市公安局资料,常住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数据来自统计部门基于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估算。

“外来人口”通常被理解为“不具备当地户籍的人口”，有时还特指“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以及“外地进城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务工者”。针对北京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显示，北京常住就业人口约977万，其中户籍人口约529万，仅占就业人口的54%左右。^[3]因此北京市针对外来人口的调控措施大多瞄准潜在的外来进京就业者，比如减少进京指标、严格迁入审批制度以控制户籍人口的机械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区域合作以向周边地区疏解流动人口等。

事实上，外来人口绝不只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低端人群”，其构成值得细致考察和深入分析。在北京市户籍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外地籍贯的户籍迁入者，即第一代“北京新移民”，严格意义上讲也属于外来人口；而在不具备北京户籍的人口（有时也被称为流动人口）中，有些人已经在京工作多年而有望获得“工作居住证”，或者因嫁娶而居留下来，成为事实上“不流动”的流动人口。这些人群均是外来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本地户籍人口和通常意义上“外来人口”的独特性，其对人口迁移的“带动能力”更是值得关注；换句话说，那些与既已落户或居留北京的外来人口紧密相关的潜在“随迁人口”的规模亦不容忽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城市未来的人口规模和结构，预见这一状况并做出适当应对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三、数据及处理方法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基础包括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北京人口数据，北京市2000年以来的统计年鉴中有关人口结构的宏观统计数据，2004~2013年的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其中人口普查数据和年鉴数据是整体性比较的基础，婚姻登记数据则为人口分类提供重要依据，并作为一个重要的人口子集反映北京市人口结构的特点、变动趋势及可能影响。

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包括200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10年中全部在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夫妇的相关信息，共有数据记录1 964 641条（每对夫妇为一条记录）；其中结婚登记记录1 483 289条（占比75.50%），其余为离婚登记和补发补办证件的记录。由于再婚群体和涉外婚姻的情况相对复杂，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主要集中在大陆地区的中国籍初婚人口共243万余人，其中男性约120.4万人，女性约122.9万人。

根据我国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夫妇需要至少一方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因此结婚登记者根据其登记时刻的“户籍所在地”可以被划分为“北京户籍人口”和“京外户籍人口”两类；而在“北京户籍人口”中，一部分是北京本地人^①，另一部分则是自外省市迁入北京落户的，即第一代“北京新移民”，这一点可以根据“身份证号码前两位”判断出来。根据我国身份证号码的编制规则，前两位数字标识了身份证办理时刻的户籍所在省份，这通常也是登记者的原生家庭所在地或主要的婚前居住地。由此我们将北京近10年的初婚者划分为三类：本地人口，户籍所在地和原籍均为北京；迁移人口，具有北京户籍但原籍非北京；流动人口（有些研究亦称暂时迁移人口或常住非户籍人口），户籍所在地不在北京^②。表1显示了分性别的三类人群的分布情况^③。

① 这里“北京本地人”并不意味着祖祖辈辈生活在北京，但至少从其父辈开始就已经是北京常住户籍人口了。

② 还有一种情况是“迁出人口”，即原籍为北京但户籍不在北京；但数据库中具有这一特征记录的数量极少，因此我们未将其包含在研究对象中。

③ 对于持护照登记的出国人员和持军官证、士兵证的登记者，我们无从对其原籍等相关信息做出判断，因此这部分记录未包含在研究对象中。

表1 北京2004~2013年初婚者的人口流迁类型分布(%)

年份	男性				女性			
	本地人口	迁移人口	流动人口	合计(人)	本地人口	迁移人口	流动人口	合计(人)
2004	70.12	18.36	11.53	93 907	55.69	13.72	30.59	100 070
2005	68.40	18.16	13.44	72 031	51.21	13.17	35.62	77 870
2006	68.01	19.19	12.80	133 507	54.28	14.39	31.33	143 773
2007	64.63	20.85	14.53	88 328	49.30	15.11	35.59	95 364
2008	63.51	21.64	14.85	114 446	49.00	15.57	35.43	122 511
2009	63.44	21.55	15.01	144 046	49.94	15.49	34.56	153 633
2010	61.41	23.08	15.51	107 352	48.41	14.69	36.90	112 134
2011	60.70	24.38	14.92	139 128	49.80	16.36	33.84	143 032
2012	61.16	24.24	14.60	138 653	50.79	16.82	32.39	142 064
2013	58.91	25.72	15.37	121 590	48.36	17.75	33.89	124 507
总体	63.65	22.01	14.35	1 152 988	50.64	15.46	33.90	1 214 958

资料来源:基于北京婚姻登记数据计算。

从表1可以看到,10年中外来人口在初婚人群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男女本地初婚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并均在2013年达到最低点,而男女迁移人口的比重则有显著的上升趋势,此外流动人口(特别是女性)在初婚者中的占比也非常可观。

表2 北京2004~2013年总人口与初婚人口的流迁类型分布(%)

年份	总人口			初婚人口			
	户籍人口	流动人口	合计(万人)	户籍人口(本地)	户籍人口(迁移)	流动人口	合计(人)
2004	77.91	22.09	1 492.7	62.68	15.97	21.36	193 977
2005	76.77	23.23	1 538.0	59.47	15.57	24.96	149 901
2006	74.80	25.20	1 601.0	60.89	16.70	22.41	277 280
2007	72.39	27.61	1 676.0	56.67	17.87	25.46	183 692
2008	69.45	30.55	1 771.0	56.01	18.50	25.49	236 957
2009	66.98	33.02	1 860.0	56.47	18.42	25.10	297 679
2010	64.09	35.91	1 962.5	54.77	18.79	26.44	219 486
2011	63.26	36.74	2 020.1	55.17	20.31	24.51	282 160
2012	62.64	37.36	2 071.3	55.91	20.48	23.60	280 717
2013	62.12	37.88	2 119.0	53.57	21.69	24.74	246 097

资料来源:总人口数据来自《2014北京统计年鉴》;初婚人口数据基于表1计算。

在表2中,我们将2004~2013年的总人口和初婚人口的流迁类型进行对比,可见二者在分布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相比总人口,各年新增初婚人口中流动人口的比重相对稳定。

以青壮年为绝对主体的初婚人口是北京市总人口的一个重要子集,婚姻通常与定居紧密相关



(尽管不排除婚后移居他乡的情况,但从比例来讲通常是极少数),也就是说,这些婚姻人口将是北京更为稳定的常住人口,其中的流动人口因其配偶具有北京户籍而减少了很多“体制外生存”的不便及未来的不确定性^①,从而成为事实上的“北京新移民”而安居下来。这一代新移民群体的结构性特征将对北京未来整体的人口结构及人口发展趋势发生重要影响。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婚姻登记数据库中迁移人口户籍所在地的变化(从原籍到北京)基本上因就业而发生。通常来讲,就业、婚迁和投靠是户籍发生地区转移的三条最主要途径,由于数据库记录的是结婚这一时点(且本研究考虑的是初婚人群)的户籍状态,因此排除了婚迁的可能性;另外数据库所涉及的初婚人群大多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生于1975年及之后的初婚男性占比90%,初婚女性占比96%),按国家规定大多在年满16岁时办理身份证,在办理身份证至结婚期间因投靠而迁移户籍的个案也不会太多。因此,初婚人群中的迁移人口大多因就业而落户北京^②。

婚姻登记业务数据不存在抽样调查中最为常见的样本偏差问题,婚姻登记部门在办理业务时对信息的审核则确保了每一对夫妇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该数据为我们做出客观、准确的统计分析和判断提供了重要保证。

四、人口结构特点和变动趋势分析

以下将人口普查、人口宏观统计数据 and 婚姻登记数据相结合,从人口的落户区域、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年龄结构等角度对北京总人口和新移民人口的结构特点和变动趋势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可能的影响。

1. 户籍人口的落户区域分布

特大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心城区的人口过于密集,进而在交通、能源、住房等方面产生诸多问题。北京市在2005年初将全市18个区县划分为四大功能区,试图通过调整产业布局削减中心区的人口规模,引导人口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合理分布。

在表3中,择取近10年中的三个时间点,分别考察了2004、2009和2013年全市户籍人口、初婚人群中的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户籍属地在各功能区的分布情况。从时序角度看,各类人口的户籍空间分布确实呈现出一定的“疏散”迹象,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比重均有所下降,但疏散的方向则表现出不同特点。总体的户籍人口在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基本向城市功能拓展区集中;而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初婚人口的户籍则是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逐步转向其他两个功能区。横向对比来看,本地初婚人口与整体户籍人口的户籍分布状况非常接近,特别是在2004年,此后本地初婚人口的户籍迅速由传统的“城八区”转向外围,户籍人口则向城市功能拓展区集中;相比之下,初婚迁移人口的户籍分布尽管也表现出向外围城区扩散的趋势,但在具体分布上显然高度集中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特别是西城、朝阳、海淀这三个分别以金融、商业和教育为特色功能的城区。

^① 根据北京市户籍管理的有关规定,非京户的一方在婚姻满足一定年限后可以向公安部门申请落户;此外,在北京市逐步放宽未成年子女可以随父落户的条件之后,“单京户家庭”的居留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② 数据库中也存在一些在校大学生登记结婚的情况,其户籍迁移因求学而发生,且在毕业后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在总体中这一群体的比例非常低。

表3 北京户籍总人口与初婚户籍人口的落户区域分布(%)

行政区划	2004年			2009年			2013年		
	户籍总人口	初婚本地人口	初婚迁移人口	户籍总人口	初婚本地人口	初婚迁移人口	户籍总人口	初婚本地人口	初婚迁移人口
首都功能核心区	19.75	18.21	24.88	18.35	18.12	24.77	18.10	16.81	23.57
东城区	5.35	5.68	9.59	4.98	4.96	8.39	7.40	7.12	8.28
西城区	6.63	6.32	10.89	6.37	5.79	12.17	10.70	9.69	15.29
崇文区	3.17	1.40	0.69	2.69	2.68	1.16	-	-	-
宣武区	4.60	4.82	3.71	4.31	4.69	3.05	-	-	-
城市功能拓展区	41.06	40.74	64.36	43.53	36.98	63.53	44.47	32.10	62.65
朝阳区	14.25	15.92	18.10	14.87	13.87	18.45	15.29	11.68	17.64
丰台区	8.01	8.04	6.17	8.44	8.39	6.03	8.46	7.55	7.17
石景山区	2.97	3.12	2.32	2.89	3.04	2.16	2.86	2.54	2.35
海淀区	15.83	13.65	37.77	17.32	11.68	36.89	17.88	10.33	35.49
城市发展新区	25.39	26.65	8.66	25.02	30.22	9.18	24.98	33.13	10.74
房山区	6.47	6.66	1.49	6.16	7.40	1.47	5.97	8.19	1.62
通州区	5.33	3.84	0.92	5.27	6.03	1.53	5.26	7.15	1.76
顺义区	4.76	5.79	0.94	4.64	6.31	0.91	4.57	7.32	1.16
昌平区	4.03	4.34	2.60	4.20	4.32	2.89	4.35	3.76	3.88
大兴区	4.80	6.02	2.72	4.76	6.16	2.38	4.83	6.71	2.32
生态涵养发展区	13.79	14.40	2.10	13.10	14.68	2.52	12.45	17.95	3.04
门头沟区	2.04	0.80	0.22	1.96	2.16	0.58	1.89	2.09	0.62
怀柔区	2.34	2.75	0.57	2.23	2.42	0.57	2.12	2.71	0.88
平谷区	3.39	4.11	0.36	3.19	3.86	0.36	3.03	5.50	0.38
密云县	3.66	4.72	0.64	3.46	3.63	0.63	3.27	4.44	0.57
延庆县	2.36	2.03	0.31	2.26	2.61	0.37	2.13	3.19	0.58
人口规模(万人)	1 162.90	11.30	2.80	1 245.80	16.80	5.50	1 316.30	12.90	5.20

资料来源:户籍总人口数据来自2005、2010、2014年《北京统计年鉴》,数据由北京市公安局提供;初婚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数据基于北京婚姻登记数据计算。

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并未得到实质性的缓解。考虑到特大城市普遍存在的“人户分离”问题,实际的人口居住分布状况或许相比表3数字所显示出的分散度要高。但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医疗、商业、文化、社会服务等优势资源的集中,中心城区的吸引力还是要远大于周边;如果各区域的资源分配和发展水平不均衡的格局无法改变,那么在中心城区落户或安居的竞争也必将会持续下去且更为激烈。

2. 各类人口的教育文化程度分布

教育文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总体素质的关键指标,对于特大城市而言,大量外来人口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原本的平均文化水平。在表4中,我们将2004年以来的初婚人口与大致同龄的全市人口(含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的教育文化状况进行对比。

表4 各类人口的教育文化水平分布(%)

人口类别		小学及以下	初中	技校/职高/中专/高中	大专/本科	研究生	人口规模(人)
全市20~44岁人口	男性	2.79	34.03	20.89	36.25	6.04	5 347 998
	女性	3.43	28.46	20.51	41.74	5.86	4 865 339
初婚本地人口	男性	1.38	11.86	29.09	54.24	3.43	733 666
	女性	1.07	7.14	24.47	63.74	3.58	615 046
初婚迁移人口	男性	0.12	0.90	2.38	44.73	51.87	253 681
	女性	0.12	0.65	1.22	39.88	58.12	187 814
初婚流动人口	男性	3.63	15.52	12.42	56.53	11.89	162 506
	与本地人口结合	5.31	22.70	17.33	50.06	4.61	107 561
	与迁移人口结合	0.50	2.06	2.98	68.56	25.89	54 945
	女性	2.49	18.49	19.22	52.37	7.44	384 401
	与本地人口结合	3.66	26.05	24.50	43.62	2.17	262 570
	与迁移人口结合	0.35	2.90	6.63	70.90	19.22	121 831

资料来源:全市20~44岁人口数据根据《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相关数据计算;初婚本地人口、初婚迁移人口和初婚流动人口数据基于北京婚姻登记数据计算。

全市20~44岁常住人口的教育文化程度分布反映了整体水平,相比之下,初婚人群的文化程度分布更多偏向高学历水平,特别是迁移人口,具备大学及以上高学历的男性和女性的比重分别达到96%和98%;初婚流动人口的学历分布显示出一定的分散性特征,一方面高学历人口的比重高于本地人口,另一方面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人口的比重也高于本地人口。从婚姻匹配的视角将流动人口做进一步细分就会发现,凡是与迁移人口相结合的流动人口明显偏向高学历,而与本地人口相结合的流动人口则明显偏向于低学历。学历结构较为复杂的初婚流动人口由此形成了明显分层,高学历者大多与迁移人口结合成为“新移民高知夫妇组合”,低学历者则大多与本地人口(婚姻登记数据显示也是低学历的本地人口)结合。

3. 各类人口的职业类别分布

职业类别和层级与学历水平密切相关,通常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职业地位也越高;^[4]而职业类别和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个体社会地位的高低,林南等在分析中国城市的就业与地位获得时将农业、商业等七个职业类别进行了排序,^[5]张翼在综合评价权力、收入等因素的基础上也将职业阶层从低至高定义为粮农阶层、采掘业和制造业阶层等七类。^[6]与之大体对应,我国在宏观统计层面定义的七大类职业划分也具有类似的层级性。表5分别显示了总人口与初婚人口在职业类别上的分布^①。

表5中各类人口的职业分布特征表现出与表4高度的一致性,即初婚人群相对于全市抽样人口更多偏向于较高的职业层级,其中迁移人口的职业分布尤其高度偏向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序列,超过七成的人从业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个职业类别。

① 由于普查数据中没有统计“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所以这里只列出了六类;同时为了和普查数据的职业分类保持一致,对初婚人口的分类统计也没有包括选项为“其他”的记录。

表5 各类人口的职业类别分布(%)

人口类别		国家机关党 群组织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	专业 技术 人员	办事人员 和有关 人员	商业及 服务业 人员	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农林牧渔 水利业生 产人员	人口 规模 (人)
全市抽样人口	男性	3.79	16.45	16.01	28.71	29.59	5.45	567 340
	女性	1.84	25.83	14.70	40.91	10.43	6.30	410 555
全市非户籍 抽样人口	男性	2.95	11.24	10.60	40.87	32.83	1.52	263 384
	女性	1.38	15.68	9.66	58.40	13.35	1.53	185 486
初婚本地人口	男性	5.96	43.60	23.83	5.56	14.55	6.50	626 629
	女性	4.85	47.62	24.49	4.94	11.63	6.47	526 115
初婚迁移人口	男性	19.04	55.48	21.87	1.40	0.13	2.07	203 617
	女性	16.11	56.32	24.27	1.83	0.20	1.28	154 111
初婚流动人口	男性	4.10	44.56	21.10	6.24	20.02	3.98	141 180
	与本地 人口结合	2.83	36.05	19.30	7.48	29.23	5.11	93 082
	与迁移 人口结合	6.38	59.57	25.40	3.93	2.91	1.82	48 098
	女性	2.86	42.43	21.60	5.58	24.12	3.42	322 022
	与本地 人口结合	1.83	34.06	19.45	6.83	33.59	4.24	218 198
	与迁移 人口结合	4.77	56.51	29.38	3.22	4.63	1.50	103 824

资料来源:全市抽样人口数据根据《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相关数据计算;全市非户籍抽样人口数据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相关数据计算;初婚本地人口、初婚迁移人口和初婚流动人口数据基于北京婚姻登记数据计算。

不论在总人口还是初婚人口中,流动人口分布都更偏向于低层级的职业序列。但是从婚姻匹配的视角进一步考察初婚人口就会发现,与迁移人口相结合的流动人口和与本地人口相结合的流动人口差异显著,前者明显偏向于高层级的职业序列,后者则相反。

4. 外来人口对总人口年龄结构的可能影响

根据国际通用的衡量标准,北京市在2000年已经全面进入老年型社会,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比重为18.2%,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7]基于2014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常住人口年龄构成”和“户籍人口年龄构成”的计算表明,2013年末北京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中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14%和21.5%,老龄化形势不容乐观。

有关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及老龄化问题的一些研究认为,流动人口(特别是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加入大大延缓了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延续了北京的“人口红利”期,^[8-9]通过引入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年轻人才可以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从而降低人口抚养比;^[10]而近年来北京市不断升高的老龄人口比重,也基本上被解读为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下降和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即“高龄少子化”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劳动年龄人口时,很可能忽视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老龄人口的机械增长问题。结合婚姻数据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个粗略的估计。

表6 北京近年的婚配模式分布及可能的随迁老龄人口估算(%)

年份	本地男+本地女	本地男+迁移女	本地男+流动女	迁移男+本地女	迁移男+迁移女	迁移男+流动女	流动男+本地女	流动男+迁移女	合计(万对)
2004	45.35	3.79	21.16	4.55	7.30	6.78	8.08	3.01	8.91
2005	40.99	2.58	24.95	3.65	7.58	7.45	9.30	3.50	6.78
2006	45.92	2.89	20.12	4.03	8.95	6.79	8.03	3.28	12.55
2007	39.33	2.56	22.96	3.52	8.79	9.09	9.35	4.40	8.23
2008	39.25	2.44	21.96	3.14	8.76	10.38	9.12	4.94	10.78
2009	40.29	2.37	20.85	3.09	8.40	10.77	8.96	5.26	13.68
2010	37.74	2.16	21.65	3.17	7.92	12.88	9.28	5.19	10.12
2011	39.08	2.48	19.25	3.40	8.66	12.90	8.61	5.62	13.06
2012	40.62	2.54	18.18	3.36	8.80	12.58	8.09	5.83	12.94
2013	38.15	2.64	18.30	3.27	9.29	13.88	8.21	6.26	11.20
总体	40.66	2.62	20.62	3.49	8.51	10.60	8.65	4.85	108.25
可能随迁老龄人口(万人)	-	5.68	44.63	7.55	36.86	45.89	18.74	20.98	180.33

资料来源:基于北京婚姻登记数据计算。

由于在京登记结婚的夫妇只要一方具备北京户籍即可,因此本地人口、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之间可以形成八类夫妇组合。从表6所示的分布结果可见,在近10年总共108.25万对初婚夫妇(双方均为初婚)中,仅有约40%为本地人口的组合,其余60%都属于“两地婚姻”,其中“迁移男+迁移女”、“迁移男+流动女”和“流动男+迁移女”这三类“双外来人口组合”的比例总体上已经超过20%且有显著的逐年上升的趋势。

两地婚姻的增加是社会开放度提升的一种表现,也是特大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另一方面,“异地养老”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婚姻数据库所涉及的人群主体恰好是我国步入成年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养儿防老”观念仍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投靠子女或许将是其父母一代的养老首选,这意味着每一位定居北京的新移民背后都有两位可能随迁入京的老人。在极端情况下,每一对“外来人口+当地人口”的组合将产生两个老人的入京需求,“双外来人口组合”则相应产生四个老人的潜在入京需求,由此我们基于表6可以估算,2004年以来的两地婚姻可能引致约180.3万的随迁入京老人。事实上,由于表6的对象为初婚夫妇,排除了与再婚者结合的初婚人口,如果我们基于表1进行计算,即每一个外来新移民(迁移人口或流动人口)都与两位随迁老人相关联,那么随迁人口规模的估计值将达到203.8万人。

这一极端情形下的估计数字固然有些“骇人”,毕竟不是所有的外地父母都会来京养老,而且这种随迁不会集中爆发而是逐步释放;但老龄人口的机械增长无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此外,北京常住人口中还有大量“双流动人口”夫妇未包含在数据库中作为估算基数,有研究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明显,^[11-12]已婚流动人口尤其具有强烈的留京意愿,且携眷举家迁移的势头凸显,^[13-14]与之相关的随迁人口规模亦不容小觑。

从短期看,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入确实为北京带来了人口红利,提升了北京总体的人口素质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老龄化进程;但从长期看,随着新移民的父母一代逐渐步入高龄,投靠在京子



女的需求会越发凸显^①,北京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很可能会加速向老龄化偏移。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从而导致人口构成多元化是特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总体的宏观人口统计数据 and 2004~2013年的10年婚姻登记数据的对比,分析了北京人口结构的特点和变动趋势,特别考察了外来人口对于人口结构变动的影 响。结果显示,迁移人口展现出很强的“精英阶层”特征,其户籍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区,普遍具有高学历且位于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序列;流动人口的结构相对复杂,但在婚姻匹配过程中出现明显的“分层”,与迁移人口结合的流动人口普遍具有高学历和高职业层级,二者形成“强强组合”,而与本地人口结合的流动人口则大多位于学历和职业层级的低端。不论是户籍的空间分布还是与发展前景和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的文化程度、职业序列的分布,不同类别人口的聚集和“分化”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只有当不同类别的人口形成有序和良性互动时,人口的多元化结构才可能为特大城市带来活力和繁荣;相反,如果不同群体只是相互独立地简单“拼接”,甚至出现社会隔离,那就很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北京市初婚外来人口的学历水平和职业层级的分布向高端方向持续聚集,这是“以业控人”、“以证管人”等人口调控措施和进京门槛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这种“掐尖”式的筛选机制反过来也进一步强化了北京新移民的留京意愿和决心(既然来之不易就更留下来)以及“精英特质”(较高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和良好稳定的发展前景)。与建国初期来到北京工作或读书的那一批精英移民相比,当代新移民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其父辈将在“高龄少子化”的背景下步入老年,“异地养老”问题无可避免。不论是基于两代人机会成本的比较,还是家乡与大都市资源条件的比较,外地老人前来投靠子女都是一种理性选择。这样在接下来的10~20年,老龄人口机械增长的压力必然随之加大。

从长期看,人口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和老龄化意味着对各类社会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和多样化。然而,“合理疏导低端就业人口”的政策导向使得北京很多领域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低端服务行业的形势尤为严峻。如何解决人口结构优化、人口规模控制与日益增大的社会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亦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关部门应充分关注特大城市人口结构的特点,持续追踪其发展变化,预见其影响并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政策预警,从而促进人口多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20/c_1113330964.htm.
- [2] 北京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bjstats.gov.cn/xwgb/tjgb/ndgb/201502/t20150211_288370.htm.
- [3] 尹德挺,张洪玉,原晓晓.北京人口红利的结构性分析和形势预判[J].北京社会科学,2014,(1):91-96.
- [4] Blau, P M and Duncan, O D.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M]. New York: Wiley, 1967.

^① 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政策,外地独生子女的父母退休后可以投靠子女进京落户,因此可以预见,相当数量的老人将在未来十几年内成为北京户籍常住人口。



- [5] 林南,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A].边燕杰,等.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C].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3-115.
- [6] 张翼.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J].中国人口科学,2003,(4):39-47.
- [7] 李扬,刘慧,金凤君,汤青.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时空变化特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1):131-138.
- [8] 段成荣,邹湘江.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研究:人口流动受益者的责任重构[A].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2012·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上)[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87-201.
- [9] 李晓壮.北京人口结构的变迁及优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6):50-54.
- [10] 王广州,王智勇.人口结构优化的国际大都市经验和对北京的启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3):68-72.
- [11] 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J].人口研究,2007,(2):30-40.
- [12] 段成荣,袁艳,郭静.我国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J].西北人口,2013,(6):1-7.
- [13] 侯亚非.关于“不流动的流动人口”的思考[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6):10-12.
- [14] 胡玉萍.留京,还是回乡——北京市流动人口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07,(5):40-45.

[责任编辑 王晓璐]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end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Megalopolis: The Case of Beijing

GAO Ying, ZHANG Xiul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aking Beijing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macro-level population statistical data and 2004~2013 marriage registration data, this paper make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ends of local residents, migrants and temporary migrants. Relative to the local residents, the migrants generally have household registry of central districts and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occupational layer. Temporary migrants hav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population structure but differentiat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rriage matching. “Two-place marriages” form a stable group of new permanent migrants and meanwhile imply a sizable group of latent dependent migrants. This will produc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the aging process, which may also lead to some conflicts and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prepared with policy responses so as to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diversification in megalopolis.

Key Words: Megalopolis, Population Structure, Popul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Floating, Beijing